

思勉文库



陈旭麓
著

陈旭麓学术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勉文库

陈旭麓学术文集



陈旭麓著
周武编



YZLI089012184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旭麓学术文集/陈旭麓著;周武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思勉文库/杨国荣主编)
ISBN 978-7-208-10370-2

I. ①陈… II. ①陈…②周… III. ①中国历史:近
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2766号

责任编辑 李莹 李卫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 思勉文库 ·

陈旭麓学术文集

陈旭麓 著

周武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25 插页 4 字数 410,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370-2/K·1831

定价 55.00 元

总 序

杨国荣

“思勉文库”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部分著名学者的著作选辑，文库的选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 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堃、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贯通中西之学，等等。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文库中的著作跨越了 20 世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它们融入于学界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看，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在近代以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的、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后，情况有所改变，西学的东渐以及中学对此所作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随着西学的东渐及中西之学的相遇，西学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20 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收入文库的著作，也体现了类似的视域，其中凝结的研究成果，则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在宽泛的意义上,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呈现为二重形态:它既以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为其表现形式,又体现于具有内在思想关联的逻辑脉络之中。逻辑脉络中的历史展示的主要是学术思想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则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史上各种体系之间的先后发生、前后相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把握。当然,逻辑脉络中的历史与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互不相关,事实上,二者是同一思想演化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

与学术思想史的以上区分相应,从研究方式上看,可以区分两种进路,其一侧重于历史考察,其二则更多地指向理论的阐释。理论的阐释主要以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出发点,侧重于揭示思想衍化的内在脉络。作为研究方式,理论的阐释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特定的思想系统而言,理论的阐释主要在于揭示、把握一种学说系统的主导原则与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这个主导的观念和其他相关论点之间的关系。在考察、梳理具体的思想系统时,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侧重于把某一思想系统的多方面的内容归属主导的原则,或者说,将一种体系的不同内容纳入其主导脉络或主导原则。以理论的阐释为方式,体系中的多重思想趋向,往往被置于同一主导原则或宗旨下加以理解;体系之中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每每被视为主导原则的体现或逻辑展开。从不同的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更多地侧重于揭示各个体系之间内在的共同趋向、思想脉络、逻辑关系,等等。

与理论的阐释相对的是历史考察的方式。历史考察以思想史上具体的思想情景作为出发点,更多地关注一个思想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包括思想可能具有的内在张力。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方面性、多重性的同时,历史考察进一步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如果存在内在张力,则具体考察这种张力对体系的内在影响以及它形成的内在根源,等等。同时,它又更为关注思想发生的历史背景,注重考察一种具体的学说系统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此外,它也注意从经验的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因素,包括生活处境等对思想家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质言之,历史考察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将思想体系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的思想史情境)中,由此再现其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对这种具体性、多样

性和丰富性形成的根源给予历史的解释。

从学术思想史研究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和历史考察的方式都不可或缺,如果忽视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仅仅专注于历史考察,往往会使思想史研究流于对一些枝节的琐碎关注,把注意之点主要放在那些思想史上的个别、特殊的细节,而难以真正把握思想演化过程所具有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与脉络,这样的思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容易变成材料的罗列或单纯的语境分析。反之,如果仅仅关注理论的阐释的方式,而忽视历史考察的方式,思想史研究往往会忽略思想演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将思想史化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略去思想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框架。

进而言之,历史考察与理论阐释之间关系,同时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思考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学者,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学术思想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叙述之上;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不难看到,在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阐述以及理论的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过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有所侧重不能理解为彼此划界,史与思无法截然分离。

收入“思勉文库”的著作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衍化与逻辑脉络的统一。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历史的深沉,也不难领略思想的睿智。在学术进路上,文库中的著作固然存在不同侧重:一些主要以历史源流的疏通为指向,另一些则更多地关注于理论的阐释或理论的构建,但这种不同的侧重,又基于史与思的统一这一共同的基础。要而言之,以“学无中西”、“史”“思”的统一为视域,文库中的学术著作既展示了富有个性化的理论品格,又蕴含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意义,由此,它们也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印记。

2011年7月28日

目 录

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1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	14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22
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	45
略论演化中的中国近代文化	58
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悬想	65
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73
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	88
历史·传统·现代化	
——答记者问	97
辨“夷”、“洋”	101
论“中体西用”	108
台湾建省与洋务派	130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	
——群学	146
“戊戌”与启蒙	160
庚子与辛丑	171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196
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	211
说“海派”	217
论龚自珍思想	221
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	
——兼论冯桂芬的思想	231
《李秀成供》原稿释疑	244
光绪略论	260
论梁启超的思想	268
论宋教仁	298
因袭—规抚—创获	
——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	315

《近代史思辨录》自序	325
《近代中国八十年》序言	328
《五四后三十年》序	332
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新刊本前言	334
写在《中国近代史词典》出版之后	337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序言	339
《中国革命史教程》前言	342
民主思想的长卷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序言	345
思潮与政派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序言	349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总序	354
反思,也还要一点反反思	
——序《中国文化之谜大观》	359
《〈传记文学〉篇目分类索引》序言	364
“我要回来”	
——为《澳门四百年》作序	366
献给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书	
——评《上海近代史》上册	369
道光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序《道光皇帝传》	372
《康有为大传》序	375
从革命中来,为民主而战	
——为《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作序	378
谈《宋教仁集》	382
实笔写真人	
——读《蔡元培传》	385
《秋瑾评传》序	388

《瞿秋白年谱》序 391
《苏兆征传》序 394
附录 397
苍凉的黄昏	
——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 398
陈旭麓先生传略 413
陈旭麓先生主要著述目录 417
编后记 425

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从评价洋务运动及其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的轨迹,推而及于对近代史线索的探讨。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穿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等皆是。我们在 50 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事实上,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及近代的含义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近代史线索的再探讨。这些变化是:

一、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 80 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 110 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虽然,由于前 80 年和后 30 年长期分割为近代史和现代史,讲课编书至今还是两截,前后不能贯通起来,但把前 80 年和后 30 年、新旧民主革命贯通起来写的近代史已在酝酿和准备中,且已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简编与纲要。

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近代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在史学领域中具有独特地位而被重视。但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史和民国史的研究相继热乎起来，清史后期和民国史占有近代史的全过程；这种断代为史的编纂与研究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传统，对人物、事迹及社会生活方面有很大的容量，它就使近代史处于被分解、被取代的尴尬局面。

三、近代史是相对于古代史和现代史而言，它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固定，随着岁月的流转，后浪推前浪，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将让位于后来的岁月，变为近代前的历史。人们要参考和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势必以清史、民国史和其他专史为对象，而不再以游移的过了时的“近代”为对象。

除了近代史面临的这些特有变化外，整个历史研究正由前此以阐述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史，推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广阔天地；并由预定的设想和观念去寻摘史料的研究方法，推向通过大量搜集和整理史料然后进行论证，既是观念、方法的推新，也有传统史学的回归。这些对近于凝固的近代史构架有更大的冲击力。

由于这些情况和认识的变化，我们对近代史线索的考虑，显然已不能停留于以前 80 年的近代史为对象，也不只是加上后 30 年——前后两截的拼合，应把 110 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 110 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内涵来考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在 20 年代的革命实践中考察和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并在 30 年代初发生过激烈论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近年来在史学界的一些讨论会和文章中颇有异词。但是我以为：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两者的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二、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主权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是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半，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我初听到人们的异议时，也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连在一

起太晦气,看不到近代中国人前进的足迹,其实正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它是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社会的出发点。一个名词的表象有其必然的内蕴,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还是比较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实质的。即使在学科的发展中研究出了更贴切的新名,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将作为历史名词而永存。梁启超曾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他曾在《过渡时代论》中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虽没有能说出从哪里过渡到哪里,但他深深地觉察到传统社会在他面前已是无情地崩溃了,却又看不到新社会的成长,长期处于过渡的苦恼中。过渡,倒也道出了110年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传统(封建)社会毕竟已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步伐;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到文化生活都有了近代的新内容,这种新内容尽管微弱,却是在缓缓地增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这句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有两点启示:一、“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潜台词是有资本主义——不充分的资本主义;二、由不充分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它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性,这个大过渡的社会中国之前没有过,今后的中国也不可能再有,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特殊社会形态。应该从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走出80年的近代史框架,理出110年近代史的线索。这样,才是断代的清史和民国史所不能取代;这样,才不必再为“近代”坐标的转移而担忧;这样,它在各种形式的中国史著的大家族中才有永存的地位。

那么,就这个110年构成的过渡的近代社会形态着眼,它的线索究竟是什么?线索只是一条还是多条?为了不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也避开划分阶段的纠缠,我曾依循事态的变化、发展,用纪事

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3题(题下有子目),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八十年》(1983年),不言线索而线索自在其中。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想在此基础上进而编著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个结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读者一时颇感新颖,给予鼓励。但也有文章隐约地点出: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倒退与否,确可商榷。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按三大革命高潮分期模式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胡绳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一本别具风格的书。

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也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径与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前此对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讨论,有着着眼于阶级斗争的,也有侧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即使共同以阶级斗争或社会经济发展为标志,在编纂史著的具体运用中也有各自的理解和选择。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多样的不是惟一的。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但这样,看不出变革的性质,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为了较完整地表述我的想法,我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我使用近代化一词与现代化有别),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我们现在研讨近代中国110年的变革,大谈近代化而讳言资本主义化,因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建制却又是失败的。而“五

四”以来,我们的革命虽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集中反映“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也还是资产阶级的范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但是,我们已在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憧憬社会主义的前景,而历史的现实是,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回避不了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又脱离不了民主主义。30年代,柳亚子在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说的一段话,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受。他说:“封建制度的时代已过去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但现在——现实的世界,想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吧!我早就对(邵)力子讲过,我们不作空虚远大的幻想,我们只要做成一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比较有价值的志书就称心满意了。”^①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乐于使用近代化一词,因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不排斥那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又较能体现中国人前进中的感情和脚步。

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二

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苏联影片《难忘的一九一八年》,最近问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都是抓住历史链条上的环节而编著的。我们要是写一本《一九七六年》,写出那地动山摇、泪洒乾坤的悲壮日子,将是一本多么牵动人心的书。如果说以年系事的编年史是平均地没有区别地对待历史年份,那么历史线索则要从长串的历史年份中找出其环节性年份;抓不住环节,也就很难理出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来。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其理由也许就在此。

近代史虽只110年,但它是古今中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这里不一一罗列近代史

^① 柳亚子:《关于上海通志的话》。

上那许多环节性年份,只着重阐明那些显示新陈代谢、推动近代化而具有阶段性的年份;由于通史和专史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有的虽久已被视为重要的或划时代的历史年份,在这里也不能不有所变通,不予特别标出,而把它的重大意义贯串于有关章节的文字之内。这不是论者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是近代通史同党史、革命史、工运史、文学史一类专史的主题在选材和体例上产生的不同。现就以上认识和要求分述近代的重要历史年份如下:

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史学界援引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中国社会自身的某些变端,把中国近代的开端划在17世纪上叶的明清之际。但英国革命在当时并没有触动远隔重洋的中国,中国内部的变端也只是一点征兆而已,无论李自成打进北京或清军入关,都仍是中国历代周期性动荡的再现,看不出时代的跳跃。新近译出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封面上标明“1800—1911”,以18世纪跨入19世纪的1800年为晚清即近代的界标,理由是清朝历史的重心自此由所谓“亚洲腹地”——满、蒙、新、藏推向中国的本土和沿海。但这只是清朝封建统治的扩展和内部政治的调整,并没有引发社会政治全局性的变动。近年也有从半封建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增长立论,认为要到辛亥革命才算得上进入近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熟后爆发出来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阶段,不是近代社会的发端。

作为过渡社会形态的近代中国开始于1840年,我以为不是任何其他重要历史年份所能取代的。至于1839年英军已经在九龙口、穿鼻洋、官涌等处与清军接仗,鸦片战争应上推到这一年。我们当注意到这个事实,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曾用黑体字标出“1839—1919”字样。这并不影响1840年的成说,因为被任命为英军侵华全权委员、兼英国远征军海陆联军总司令的懿律(George Euiof)率领主力舰队来华,全力发动侵略战争是在这一年,前此还是小接触。

二、1860—1861年，是经历了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的年份。人们说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的当初就感觉到了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认识的，由此在观念形态上产生了某些变化，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洋务事业的发轫，资本主义商品的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冒头，它们给封建的封闭体打开了缺口，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虽然是灾难迫发出来的微弱反响，却是具有时代气息的，应该说中国近代的新旧递嬗在这里已明显地呈现。过去没有把它列为阶段性的历史年份，事实上它是一个带转折性的历史年份。

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大规模自发农民起义终结的1873年，无疑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年份，而太平天国的失败对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继续和其间的变嬗都有很大影响。但它与1873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终结，都没有摆脱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历史循环的结局，并不体现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倒是1860年左右中国吐露的改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呈现的阶段性的最没有争议，因为它标志着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阶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明显地划出了一条战前战后的线。许多爱国人士感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徒然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已不足恃，而且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有限发展也将受制于封建主义，为其腐蚀。所以有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也同时并起，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形势。

其后，由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1900年和1905年，也都是重要的新陈代谢年份，但它们只是甲午战争后形势的演变和发展，是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内的环节。当然，1900年外有八国联军的进犯，内有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朝“新政”，是又一个全国鼎沸的年份，除了它不及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那样富有转折意义外，所表现的阶段性也是不应忽视的。在这里所以不把它作为独特的历史年份列出来，也因为从时间上它与甲午战争的距离近，层峦叠嶂，云雾弥漫，“剪不断，理还乱”。

四、1911—1912年，这个由武昌起义、诞生南京临时政府组成的年份，推翻了清朝，推翻了两千几百年的封建帝制，对清史来说是终结，对民国史来说